

学习美学，必须中外兼通，古今淹贯。先师邓公以蛰，哲人云亡，典型犹在；前辈宗老白华，崇论宏议，当今楷模。时，研究中国学术，不但要深谙中国典献，亦需要博习外国文字。往如辜氏鸿铭，陈氏寅恪，实为前趋；今如朱氏光潜，钱氏锺书，堪称巨擘。

书中所引，大都文言；叙述因之，恐文白杂糅，难以调和。同时，引证多而叙述少，“以经解经”，较为确切；盖欲存其本来面目，以便读者评骘，褒贬取舍，方有准的。至于文体，宜“少而精”；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此书定稿，适值三伏，俯案急书，汗流浃背；譬之浮瓜沉李，借以消暑，亦一乐也！

一九八〇年七月

前

言

前　　言

草《诗论》竟，弁以前言，略述内容与作法，并纪认识与感想。

先谈内容与作法：

诗，起源甚早；有人类就有劳动，有劳动就有诗歌。《康衢》之谣，《卿云》之颂，姑勿论矣；《三百》雄篇，采自民间，脍炙人口。中经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浸假而至有唐，诗体大备。一变为楚骚，再变为汉赋，宋元之际，演为词曲。百花齐放，猗欤盛哉！

鉴赏与创造，相因而生，相辅而成，脈络通貫，互有启发！故诗作既多，诗论自繁。《虞书》有“言志”之说，《周官》有“六义”之分，是为滥觞。孔门三哲，分别有所发明，其论为“思无邪”，“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以及“中声所止”，去古未远，大抵以“美善相乐”（荀子语）为要旨。时至汉魏，相如“迹心”之说，子桓“欲丽”之论，对于内容和形式之关系，继仲尼“文质彬彬”之后，大有进展。六朝政治变化虽云混乱，文艺理论却甚苞茂。沈约之流，崇尚音律，“四声八病”，矜为奥秘。有人认为有伤真美（见钟嵘诗品），有人认为可增真美（见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勰《文心》，钟嵘《诗品》，前者统论文而后者专言诗，乃文学评论两大著作；并以“自然”立论，影响于后世者至深且巨。唐人造作多而议论少，宋人造作少而议论

多，所谓诗话，连篇累牍。如唐杜甫之“转益多师”，白居易之“讽谕”，司空图之“思与境偕及妙契”；宋邵雍之“以物观物”，欧阳修之“穷而后工”，苏轼之“诗中有画”，严羽之“以禅喻诗”；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金元短祚，论述较稀，金有元遗山“正体”之说，元有方虚谷“辞髓或高格”之论；而后者以“髓”言诗，尤为新颖深刻。下逮明清，有作结论倾向。明二李（东阳梦阳）一何（景明）主“格调”，重在诗之形式，即彦和所谓“形文”与“声文”；王渔洋主“神韵”，袁子才主“性灵”，重在诗之内容，即彦和所谓“情文”。二者相较，“性”实“神”虚；究其实际，所差甚微。按美学术语，“韵”乃韵味（taste），“灵”乃灵机（inspiration）；艺术创造，均属关键。学诗论诗，向以诗运退化，力追风雅；斯皆昧于社会变革，后来居上。叶燮矫枉，反主“进化”；至理名言，用以为殿。以上所列，理论根据，要不外乎儒道释三家。举例言之，“中声所止”，儒家也；“物观妙契”，道家也；“以禅喻诗”，乃释氏也。择焉不精，语焉不详；抛砖引玉，以俟贤者。

首次谈认识与感想：

诗乃纯粹艺术，其所以引人入胜，必有其独特之处。能诗者方可论诗，同声同气，共感共鸣。平日虽喜吟咏，但不就绳墨，荒腔走调，打油而已，曷足言诗。因之，纸上谈兵，自难当行出色。

艺术关涉美学，而美学以美为旨归。美植根于哲学，表现于艺术；而其取材，则在自然与社会。艺术品乃实际之反映，“感物吟志”，由外及内；“诚中形外”，由内及外。客观与主观交融，内容与形式统一；在诗如此，其他亦然。

目

录



目 录

前言：中国诗学概要	(1)
言志说 虞书 舜典	(1)
六义说 周礼 春官	(5)
思无邪说 春秋 孔丘	(9)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说 战国 孟轲	(14)
中声所止说 战国 荀况	(17)
迹心与欲丽说 汉魏 司马相如扬雄和曹丕	(19)
声病说 六朝梁 沈约	(22)
自然说 六朝梁 刘勰和钟嵘	(29)
转益多师说 唐 杜甫	(35)
讽谕说 唐 白居易	(42)
思与境偕及妙契说 唐 司空图	(47)
以物观物说 宋 邵雍	(63)
穷而后工说 宋 欧阳修	(70)

诗中有画说 宋 苏轼	(76)
以禅喻诗说 宋 严羽	(80)
正体说 金 元好问	(86)
诗髓或高格说 元 方回	(94)
格调说 明 李东阳李梦阳和何景明	(101)
神韵说 清 王士祯	(104)
性灵说 清 袁枚	(110)
进化说 清 叶燮	(117)
中国美学史论丛简目	(128)

言志说

两汉以前，诗之理论，虽多为隻言片语，但影响所及，实深且巨。其最早者，为“诗言志”。书云：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虞书·舜典）

继之而言者，则有左传：

诗以言志。（襄二十七年）

诗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

庄子云：

诗以道志。（天下篇）

荀子云：

诗言是其志也。（儒效篇）

诗为心灵之流露，假借语言以抒发，所谓“言志”与“道志”，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义。但须言之有物，此志乃客观事物之反映，非主观意念之悬想。

诗与散文之区别，在于诗之有显韵，能歌而非徒歌，必须合乎音律，所谓“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以至“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在古代，音乐谓之“音”，而“乐”乃指诗歌、音乐和舞蹈之合体。就诗言之，不独用语言歌诵，而且形诸舞踊。周礼云：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

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春官·大司乐）

诗经云：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

礼记云：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记）

所谓“乐德”，盖指音乐；所谓“乐语”，盖指诗歌；所谓“乐舞”，盖指舞蹈。诗歌、音乐与舞蹈，合而言之，通称曰乐，亦即“唯乐不可以为伪”之所谓乐。“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虽各有不同之媒介和意义，但皆“本于心”，其目的在于言志。此其志，不独要美，而且要真要善；艺术之所以为美育，智、德、体渗透其中，推动社会向上发展，固为人生所不可缺。

同时，古代所谓“乐”，乃与“礼”相对而言。艺术可以分为静的艺术和动的艺术，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属于静的或空间艺术，有建筑、雕刻与绘画；属于动的或时间艺术，有诗歌，音乐与舞蹈。儒家注重礼乐，所谓“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语），而礼乐实乃

一切艺术之综合，即“礼”包括静的或空间一类艺术，“乐”包括动的或时间一类艺术。后者上文已明；前者盖因行礼须有明堂宗庙等大建筑，而雕刻与绘画往往为其附庸。

志为“心之所之”，即汉翼奉所云：

诗之为学，情性而已。（汉书本传）

宋朱熹亦云：

诗本性情。（论语注）

性之与情，乃“诚于中而形于外”。性中无诗不能吟，情中无诗不必吟；若强吟之，则为“无病呻吟”。就情而言，种类繁多；悲喜两端，乃其著者。礼记云：

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檀弓下）

王夫之释之云：

陶，温和在中之意；咏，歌吟也；犹，体动摇与歌吟相应也；舞者，动摇之极致。（礼记章句卷四）

礼记云：

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

（檀弓下）

王夫之释之云：

愠者，哀不能宣而内结于心也；戚，气伤心病也；叹，舒其气也；辟，气迫于中，叹不足舒，躁而自艾也；躁而不宁，愤不可止，则踊矣。（礼记章句卷四）

发扬欢欣，涤除郁结，“兴于诗”而“成于乐”。中外哲人，如孔丘，如亚里士多德，固已就美学观点加以论列。

制礼作乐，诗寓其中；旨在平治人心，合同人群，调和人神，感通人物。另有专篇详论，兹就上文所引约略言之。

“神人以和”，“致鬼神示”；初民无知，不免含有迷信成分。“和邦国”，“谐万民”；对于社会发展，人事往来，为用颇宏。“安宾客”，“说远人”；会盟酬酢，赋诗见意，可以密切友好关系。“以作动物”；百兽率舞，六马仰沫，理虽未合而情有可通。至于辨章析义，借题发挥，斯乃引申以为典要。

六 义 · 说

六义之说，源于周礼：

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春官·大师）

六诗各有所解，故名之曰“六义”。诗经云：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诗大序）

周礼所谓“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乃言诗之内容与形式。诗大序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乃言诗之效力与用途。

后人将此六种分为两类，如唐孔颖达云：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毛诗正义）

宋朱熹本之，主张诗分“三经三纬”。均以为风雅颂系诗之体裁，赋比兴系诗之作法。然究其实，不甚切确；按照‘六诗’或‘六义’之次序，初不如此排列。

关于六诗，汉郑玄云：

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周礼注）

关于六义，孔颖达引上郑注而断之云：

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毛诗疏）

盖诗虽有六义，但以“风”为主。无论赋“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之”，雅“言今之正为后世法”，颂“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均不外乎用美刺手法推行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亦即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诗大序），“美圣德之形容，覩王化之兴废”，“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同上），故曰“各自为文，其实一也”。

赋本作法，演为体裁。屈子、荀卿，已肇其端。自汉以降，大赋如三都两京，小赋如神女长门，或铺采列绣，或荡气迴肠，与诗并驾，蔚为大宗。

至于比兴，从古迄今，有许多论述，大都认为诗作与鉴赏之精髓。汉郑众云：

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
借喻取譬，其重在物。梁刘勰云：

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
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文心雕龙·比兴）

附理起情，物我有别。唐皎然云：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诗式）

取象取义，情景相分。宋李仲蒙云：

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裴然集引）

感物吟志，其重在情。以上所举，比兴分言，合而言之，所谓比兴，乃形象思维。古今论之详矣，兹不多赘。总之，诗或写景或抒情，取材本乎自然，立意在于人心；其至者则为情景之交融，即唐司空图所谓“思与境偕”。清谢榛云：

情融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远且大。（四溟诗说）

清袁枚云：

情景虽有在内外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随园诗话）

清金圣叹云：

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鱼庭闻贯）

就美学理论而言，前者谓之“感情移入”，后者谓之“内在模仿”。二者交光互影，始足提高诗之思想性和艺术性。在诗如此，词曲亦然。举例明之：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小雅·采薇)

如此也。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

如此也。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归；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西厢记）

亦莫不如此也。宋梅圣俞云：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斯乃所谓“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庄子语），“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诗），邈乎远矣！

至于雅颂，孔丘虽有“雅颂各得其所”之美，李白虽有“大雅久不作”之叹；但多写景而少抒情，重庙堂而轻闾巷，恐非诗之正宗。

思无邪说

先秦儒家，当首推孔子；孔子歿后，派别分歧，其最著者为孟子和荀子。韩非子云：

儒之所至，孔丘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显学)

“孟氏之儒”，即孟子一派，其学统似由孔子（而曾子）而子思而孟子；“孙氏之儒”，即荀子一派，其学统似由孔子而子弓而荀子。荀子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远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若是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簾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非十二子）

荀子不但菲薄子思和孟子；对于儒家其他派别，亦攻击不遗余力。又云：

第佗其冠，神禪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儻然而终日不言，是